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5-0589-05

在 还 原 中 建 构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抽样分析

周 勇

[摘 要]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在全面梳理明代科举与文学相关史实的基础上探究明代科举与文学交互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史实收录方面,《编年》注重收录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仕宦和与科举考试、文学创作相关的重要事件,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体现了该项研究的交叉性质。在文献使用方面,《编年》大量采录登科录、碑志、行状、序跋等原始档案和集部文献,力图立体展现明代科举与文学发展的鲜活生态。

[关键词] 明代; 科举; 编年; 集部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如果说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体现的是人心所向的话,那么21世纪前后,一些学者着力于科举研究并提出“科举学”的概念,则实为一种大势所趋。它既是学界自觉进行学术反思的结果,也回应了制度建设的现实需要,其意义是重大的。科举学所涵涉的学科领域诸如政治、社会、教育、文学、文化等,不仅广泛而且相互交叠,非具宏阔之眼光与精微之识力者莫办。而任何一门以历史为对象的学问都必须建立在对基本史实的清理与体认之上,还原史实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这一过程中建构起理论研究的知识框架,进而提炼出有价值的理论命题。准此,清理科举及与之相关的事项就既是科举学的题中之意,也是科举学发展的基石。就笔者所涉足的科举与文学的研究领域而言,既有的几部堪称典范的著述如: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祝尚书先生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莫不以清理史实为第一要务。相较而言,明清时期的科举史实更为复杂,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更为深隐,可资利用的各类文献更为丰富,故而对这一时期科举与文学现象的清理就更为繁难,也更为必要,在将基本事实和文献摸清之前,要探讨明清科举与文学的相关问题,无异于沙上筑塔,笔者因之常有力不从心之感。近来欣睹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领衔主撰的《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以下简称《编年》)逐年排比明代科举和文学、文化相互作用的基本史实与文献,试图全方位立体展现出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发展历程,兼具学术性与工具性,笔者既感著者之苦心孤诣,又喜学人之受惠甚多。但兹著体大,凡400余万言,一时难以周览,本文试抽取其中一部分加以分析,一则为尝鼎一脔,以窥全豹;二则亦为笔者究心之问题而祈教于方家。

一、史实收录情况

经过前期的长期摸索、试探,明代的科举制度发展到孝宗、武宗时期已趋于成熟定型,世宗朝则可谓鼎盛,一方面,报考资格、考试形式、防弊措施等相关制度更为严密和切实;另一方面,录取人数和质量亦有大幅提高,一甲进士和庶吉士成为阁臣的主要来源。其后的隆、万、启、祯几代,明代科举日趋僵化、衰

落。因此,本文抽取嘉靖前期的两个乡试、会试年份作为样本,对《编年》所收史实、人物和文献使用等情况略作分析,以说明《编年》的部分特点。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样本的抽取在为研究提供了方便的同时,也可能产生以偏概全的危险,所以严谨的做法应该是,在抽样分析的结论上审慎地推及其余,相信细心的读者自会做到这一点的。

在书首的“凡例”中,撰者明确说明《编年》的著述宗旨是以编年形式展现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发展历程,因此重点收录的内容包括重要科举法规(包括文科举、武科举及荐举);对科举有显著影响的奏疏、会议、人物仕宦等;科场事件、科场文风及相关文体;科举风俗及相关创作等。这些史实收录原则的确立表明,《编年》撰者采取了将科举与文学进行综合研究的学术路数,试图为明代文学研究开辟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在我们选取的两个抽样年份中,史实的收录即体现了这一编撰宗旨。

嘉靖十六年(1538)是乡试之年,《编年》共收录史实 34 条,大体可归为 4 类。其中科举政令 4 条:允许承天贡生如京学例,二岁三人;大同儒学改试冀北分巡道;仍依旧典考选天下岁贡生员;令凡以“儒士”身份入试顺天府乡试者,务要查明其籍贯所在,其附籍可疑之人,取有同乡正途出身官印信保结,方许应试。与科举考试、科举教育、文学创作相关的重要事件 9 条:世宗令拆毁湛若水所创书院;谕德江汝璧、洗马欧阳衢任应天乡试主考;侍讲学士姚涑、左中允孙承恩任顺天乡试主考;两京及河南等十三布政司乡试;顺天乡试,次题“天子之道博也”一节,犯世宗名讳;湖广提学佥事陈束刻《湖广乡试录》并作序,王慎中不满于第二问策之指斥宋儒;故昌国公张鹤龄下狱死;礼部尚书严嵩指广东《试录》中“圣谟”、“帝懿”、“四郊”、“上帝”等语俱不行抬头,称陈白沙、伦迁冈之号,有失君前臣名之义,且《录》中文体大坏,词义尤为荒谬,将相关官员下巡按官逮问;李攀龙得山东督学王慎中赏拔。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仕宦 15 条:修撰龚用卿、户科给事中吴希孟使朝鲜;诏授庶吉士李玘等 12 人为翰林院编修,林廷机等 7 人为检讨,沈瀚等 6 人为各科给事中,何维柏、赵继本为御史,汪集、卫元确为主事;刑部尚书唐龙录上前坐事充军应赦者 142 人,丰熙、杨慎、王元正等 8 人不赦;礼部右侍郎张汝璧为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蔡昂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郭维藩为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署院;升左春坊左谕德掌南京翰林院事王教为国子监祭酒;左春坊左谕德张袞为南京翰林侍读学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温仁和为工部尚书,仍兼官;吏部左侍郎张邦奇兼翰林学士,署院;谪江汝璧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欧阳衢为广东南雄府通判;吏部右侍郎张潮为左侍郎兼学士,仍直经筵;左春坊左中允孙承恩为南京翰林侍读学士;冯惟敏中举;陆深召为太常卿兼侍读学士;南京翰林孔目蔡羽致仕。科举士人生卒 6 条:帅机生;高叔嗣卒;邹文盛卒;潘士藻生;陆采卒;沈一贯生。

嘉靖十七年(1539)是会试之年,《编年》共收录史实 36 条。其中科举政令 7 条:山西巡按何赞疏请增加进士科额,以补州县长吏,吏部覆如赞议,诏临期奏请;本科停选庶吉士;诏武举开科分别边方、腹里、南方为三等;世宗命自后文、武举监试御史,须请旨而定,毋得擅委;禁“创为异说,诡道背理,非毁朱子”,违者“许科道官指名劾奏”;凡试院应用物件,俱由各省科举用剩银解纳;令武举于秋九月开科。与科举考试、科举教育、文学创作相关的重要事件 8 条:御史吴悌请容应天贡士会试,不许;会试,顾鼎臣、张邦奇为考官,取袁炜等 320 人;张邦奇、陆深纂修玉牒;前大学士张孚敬请立东宫,优答之;殿试,茅瓚、罗理、袁炜等 320 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归有光再入文社;诏议明堂大飨礼,唐胄争之,下狱,黜为民;武举会试,诏取六十人。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仕宦 9 条:王慎中由山东按察佥事升为江西布政司左参议,山东按察司副使顾梦圭迁河南提调学校;茅坤中进士;户部尚书梁材致仕,以李廷相代之,仍兼翰林学士;检讨李本为南京国子司业;山西辽州同知李文利上所著书,授太常寺典簿;顾鼎臣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温仁和改礼部尚书,署詹事府;授吴从义等 6 人为给事中,高封等 10 人为试监察御史;张治任翰林学士,兼右谕德。科举士人生卒 7 条:陈沂卒;徐霖卒;杭淮卒;李时卒;夏尚朴卒;唐鹤征生;张元忬生。科举文献 5 条:戊戌科进士履历;戊戌科殿试策问;状元茅瓚殿试对策;榜眼罗理殿试对策;探花袁炜殿试对策。

总计以上两年中史实共 70 条,其中科举政令 11 条,占 15.7%。科举考试、文学创作及相关的重要事

件17条,占24.3%,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仕宦24条,占34.3%,科举士人生卒13条,占18.6%,科举文献5条,占7.1%。由此可见,《编年》比较注重收录科举人物的仕宦和与科举、文学相关的重要事件。明代的翰詹馆阁等清要文职部门和科道台垣等监察部门,既是进士(尤其是翰林院庶吉士)供职的主要单位,也是对科举考试、教育和文化有重要影响和直接作用的部门,《编年》较详细地收录了这些机构的人事变动情况,以此说明文学发展的政治文化、科举文化背景,这与纯粹而直接的文学史实不同,突显出《编年》的综合性特点。

或许应该加以说明的是,将《编年》与同为陈文新教授编撰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相关部分相比较可见,二书在编纂宗旨方面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反应在条目设置上则是各有侧重。《编年史》于嘉靖十六、十七年内所收史实,比较侧重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刊刻方面的情况,体现了鲜明的文学本位。如“归有光婢寒花去世,作《寒花葬志》以寄哀悼之情”、“《霞外杂俎》或成于今年”、“杨慎《水经注碑目》由云南按察司副使朱方刊行”、“胡缵宗刊行马汝骥《西玄诗集》,并作叙”等条目,都是极重要的文学史料,但因与科举的关系不大,故《编年》未收。另一方面,《编年》详细收录了与科举相关的行政部门的人事变迁和重要的文化事件,如《编年史》于“本年”下分别列有王立道、骆文盛授翰林院编修两条,而在《编年》中不仅更精确地将它们系于“正月”下,而且将包括王立道、骆文盛在内的29名庶吉士散馆授职的情况列为条目,庶吉士散馆后主要留任翰林官,或者被授予科道官、部曹,升迁前景远大,这批庶吉士中被授为翰林官者有19人,占65.5%,在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用人环境下,庶吉士是仅次于鼎甲的科举功名,令人艳羡。这条史料在《编年史》中说明的是王立道、骆文盛个人的仕宦经历,而在《编年》中突出的则是庶吉士这一士人群体的情况,两书的叙述方式和意义显然有别,分别提示了不同的研究角度。再如,《编年》收录了严嵩以广东所进《乡试录》格式失范、文体大坏及词义荒谬等为由,逮问王本才、陆杰、蒋淦等官员,并令天下提学官严禁士子,敢有肆为怪诞、不遵旧式者,悉黜之。这一事件无疑会起到规范文风的震慑效果,体现的是科举作为教育、文化的指挥棒的作用,《编年》收之,说明了编纂者审视文学的宏通视野和以中国文学为本位的文学观念。一些粗看起来似乎于文学关系不大,细思实则颇具考究价值的史料,《编年》亦予以关注,如嘉靖十六年礼部曾下令,凡以“儒士”身份入试者,务要查明其籍贯所在,以防冒籍、附籍应考之弊。这条科举政令表明,各地的教育资源和水平是不平衡的,这一状况对于说明文学的地域性特点,对于理解士人的交游行踪是有用的。

由以上分析可见,《编年》在史实的收录方面既突出了文学的核心地位,又反映了科举的背景和相关的文化内容,其综合性、交叉性是显而易见的。

二、文献的使用情况

由于已经确立了全书的编撰宗旨和史实的选录原则,因此撰者在尽可能全面普查存世文献的基础上,还要衡估所征引文献的实际价值。作为历史性的研究,一些基本的信史如《明实录》、《国榷》、《明史》、《明通鉴》等,自然可以用来搭建基本的叙述框架,而一些专门性的史著、笔记如《明儒学案》、《万历野获编》、《弇山堂别集》、《殿阁词林记》、《馆阁漫录》等,则可以丰富和深化对历史的认识角度。作为文学性的研究,大量的明人别集无疑应该纳入撰者的视野,其中丰富而鲜活的历史记载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现场(虽然这种还原已经不是历史的本身)。专门研究科举和八股文的前人著作如《皇明贡举考》、《皇明三元考》、《制义丛话》等则是非常珍贵的研究基础。我们来看看抽样年份的情况。

嘉靖十六年征引文献36种:《明世宗实录》、《张龙湖先生文集》、《孙文恪公集》、《骆两溪集》、《万历野获编》及补遗、《国榷》、《明会要》、《阳秋馆集》、《惟审先生履历》、《渭厓文集》、《明史》、《苏门集》、《弇山堂别集》、《文简集》、《国朝典汇》、咸丰《青州府志》、《海浮山堂词稿》、《击筑除音》、《梁状元不伏老》、《僧尼共犯》、《洗心斋读书易述》、《闇然堂类纂》、《湖广乡试录》、《遵岩先生文集》、《皇明文范》、《顾曲杂言》、《明珠记》、《南西厢》、《韩寿偷香记》、《明鉴纲目》、万历《大明会典》、《盛明百家诗》、《南馆集》、《弇州四部稿》、《皇明贡举考》。

嘉靖十七年征引文献 38 种:《茅鹿门集》、《期斋吕先生集》、《河南布政司参政王先生慎中行状》、《嘉靖十七年进士登科录》、《孙山甫督学文集》、《罪惟录》、《明诗纪事》、《白华楼藏稿》、《白华楼续稿》、《白华楼吟稿》、《玉芝山房稿》、《耄年录》、《制义丛话》、《震川先生集》、《明世宗实录》、《国榷》、《明鉴纲目》、《顾华玉集》、《遂初集》、《拘虚馆》、《乐书四圣图解》、《乐记补说》、《律吕新书补注》、《兴乐要论》、《律吕元声》、《南京志》、《端居咏》、《远游纪》、《北行稿》、《皖游录》、《古杭清游稿》、《丽藻堂文集》、《快园诗文类选》、《中原音韵注释》、《续书史会要》、万历《大明会典》、《弇山堂别集》、《疑年录汇编》、《明儒学案》。

两年合计征引文献 74 种,去其重复,实际共征引文献 69 种。从以上文献清单来看,《编年》在文献使用方面的特点是:一、原始性和工具性。所征引的文献全为原始文献,无一今(近)人研究成果,且多数文献是未经整理点校的,而即使利用点校整理的本子,编撰者也必一一核对原文,这就决定了编撰工作要以深入普查、利用原始文献为基础,具有很强的工具性,这样做虽然加大了编纂的难度和工作强度,但极大地提高了成果的质量和价值。二、稀见性和鲜活性。在对基本科举史实的叙述中,编撰者不仅使用了诸如《明实录》、《明鉴纲目》、《国榷》、《明史》等常见史部文献和一些专述科举的笔记专书,如《弇山堂别集》、《制义丛话》、《皇明贡举考》等,还广泛采用了《登科录》、《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珍贵的档案资料,这些稀见文献极具权威性。此外,大量碑志、行状、序跋等集部文献的使用,使《编年》的叙述超越了一般历史叙述的生硬、冰冷,而具有了鲜活、生动的特点。据统计,集部文献使用比例在 56% 左右,稀见文献使用比例在 50% 左右。

《编年》使用文献的原则是尽量照录原文,尤其是稀见而重要的原始科举文献更是不吝篇幅,全部收录,故而《编年》首次整理采录了天一阁所藏的 41 种明代《进士登科录》。作为最为直接和可靠的科举史料,多数《登科录》等原始考试档案长期藏于天一阁,世所罕睹,虽然 2006 年已由宁波出版社影印出版,但未经整理,尚难广泛为学界和读者所利用,《编年》将之全部收入,可谓嘉惠学林,其功甚大。我们抽取的嘉靖十七年戊戌是会试之年,此科《进士登科录》的“玉音”部分记载了当年礼部尚书严嵩为该科殿试所上的奏疏、皇帝的谕旨、读卷官及所有殿试执事官员的姓名、职衔和出身;“恩荣次第”部分记载了殿试及此后一系列重要礼仪活动的情况。这些文字记载很多仅见于《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的重要资料。《登科录》的主体是“进士履历”部分,它较详细地载录了本科 320 名进士的姓名、籍贯、所习经典、表字、行第、年龄、生辰、三代名讳及官阶、母姓、兄弟名及官阶、妻姓、乡会试名次等信息,作为第一手的传记资料,这些信息往往为正史所无,或可订补正史人物传记之失,如《登科录》记载胡宗宪表字为“汝钦”,而《明史》卷 205 本传所记为“汝贞”;《登科录》记载沈炼籍贯为“贯浙江绍兴卫,军籍,丽水县人”,较《明史》卷 209 本传所记的“会稽人”更为详细。《登科录》为当年礼部根据中式进士所报履历编刊并进呈御览,属于官方原始档案,一般而言较《明史》为可信。“策问”和“对策”部分保存了殿试的御制策问题目和鼎甲三人的对策全文,嘉靖帝以“仁育义断之方”为问,茅瓚等三人谕经铸史以对。这些珍贵的考试文献具有较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编年》将之全部收录,大大提高了自身的学术价值。

如果将《编年》与同类著作相比较,其文献使用方面的特点也反映了各自编撰宗旨和研究视角的不同。《编年》和《编年史》于嘉靖十七年均列有“茅坤中进士”一条,《编年史》引录了茅坤《耄年录·年谱》和茅国缙《先府君行实》两种文献,是将茅坤颇具波折的中式过程作为这位时文名家的生平经历来处理,突出的是作家的行实。《编年》于本条则引用了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五所记俞桐川对归有光和茅坤文章的比较评价,着眼点在科举文体、文风方面。

更有必要加以比较的是郭培贵先生所著的《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科学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出版,以下简称《考证》),此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增补写成的。于嘉靖十六、十七年内,《考证》只列出直接的科举史实(包括文、武举),对其他政治、文化史实则一概从略,突出体现了纯粹的科举史研究性质。在文献方面,除非关系重大或可资考证者之外,一般不引录原文,只以页下加注的方式标示出处,故该书索引性较强。嘉靖十六、十七两年所征引文献为:《明世宗实录》、《皇明贡举考》、《弇山堂别集·科试考》、万历《大明会典》、《嘉靖十七年进士登科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及《索引》、《钦定续文献通考》。

《钦定国子监志》、《礼部志稿》，几乎都是史部文献，这也可见该书历史研究的性质。与《考证》的线索清晰、考证严密相比，《编年》则注重收录丰富的集部文献，突出该书科举研究与文学研究交叉性的特点，采用纲目的形式大量著录文献原文，则显得眉目清楚，摇曳生姿，二书目光所注不同，可谓各具生面，各有匠心，而丰富的文献、扎实的考辨则是其共同的优长。

从以上抽样分析可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以深入普查和著录大量的历史文献尤其是稀见文献、集部文献为基础，以编年、纲目为叙述体例，以描述的方式还原了有明一代科举与文学交互发展的基本历史事项，建构起明代科举与文学研究的基本线索，同时提示了若干极具研究价值的命题，具有工具性和学术性兼备的鲜明特色。以科举的视角研究文学，有利于突破较为局限的文学观念，更加贴近古代文学的历史实际；以文学的眼光审视科举，有利于深入认识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科举与文学获得了比以往更为丰富、立体的呈现，也使科举与文学的研究获得了在更多层面上展开的可能性。因此，《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出版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参 考 文 献]

- [1] 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明中期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2] 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 [3] 郭培贵:《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 [4] 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责任编辑 何坤翁)